

目 录

题 记（胡乔木）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2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2
二、初期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	4
三、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兴起	7
四、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2
五、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18
第二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23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23
二、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25
三、五卅运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27
四、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	32
五、四一二政变前后.....	35
六、大革命的失败.....	38
第三章 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42
一、革命进入低潮和共产党人的武装反抗.....	42
二、从井冈山斗争到古田会议.....	48
三、革命走向复兴时的“左”倾错误和红军反 “围剿”战争的胜利	54
四、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和党内 “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62
五、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70

六、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75
第四章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82
一、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82
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86
三、克服右倾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90
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92
五、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95
六、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100
七、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103
八、整风运动	105
九、党的七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107
第五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111
一、战后政治形势与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111
二、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113
三、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118
四、第二条战线的开辟	124
五、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127
六、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	
纲领	130
七、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133
八、伟大的战略决战	136
九、将革命进行到底	140
十、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143
第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147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147
二、抗美援朝战争、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	
民主改革	153
三、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159

四、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163
五、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 起步.....	169
六、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外交工作.....	171
七、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	177
八、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第一个五年 建设计划的完成.....	185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91
一、八大和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 探索.....	191
二、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199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205
四、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212
五、“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的错误	218
六、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进一步探索.....	222
七、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	232
八、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和经济上 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	238
九、十年建设成就和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	246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251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51
二、“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269
三、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左”倾错误努力 的受挫.....	268
四、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278
五、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282
第九章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293
一、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293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整整七十年的战斗历程。

七十年来，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并且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为了在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贫穷而落后的国家里，夺取革命的胜利，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创造过使举世为之震惊的人间奇迹，也面对过许多棘手的难题，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不管什么困难和挫折，都阻挡不了它的前进，而只是使它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

历史证明：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检验而作出的正确选择。党的七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是先驱者们在艰苦条件下经过探索追求所得到的，是无数先烈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外人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年，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使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它们宰割中国。清皇朝在它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中国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实现政治民主？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个独立、民主、富强的课题，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驱者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

为了改变祖国的境遇和命运，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

起自社会下层并有着广泛群众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又一次地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而抱终天之恨。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的初步成长，在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下，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运动。孙中山在1905年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且努力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这场革命的目的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孙中山已察觉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某些弊端，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孙中山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按照他的主张实行起来，客观上仍只能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它取得的推翻清皇朝的胜利，证明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毕竟不能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这次革命使几千年来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它一下打乱了中国原有半殖民地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但辛亥革命没有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治纲领，没有能比较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单独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难以完全割断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中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却落到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辛亥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

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因此，可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

二、初期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国内军阀的割据和混战愈演愈烈。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这些活剧一幕紧接一幕地在中国的舞台上演出。多党制、议会制这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在民国初年都尝试实行过，结果却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旧的路已被证明是走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一场更加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之中。而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

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为以往先觉者所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他们由此认定，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

他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自觉地向封建礼教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尽管他们自身也有弱点，如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没有揭示孔学的社会根源并进而揭示改造现存的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也没有对人数最多的工农劳动群众的痛苦表示真切的同情，对他们的革命发动表示应有的期待；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但在当时说来，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这就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动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据这个口号

的倡导者陈独秀的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科学，除指自然科学外，还指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求适今世之生存”。这表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他们强调“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因而，仍不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

但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这时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日益暴露。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战争的空前残酷，战后社会的极度混乱，使世人为之震惊，引起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产生的这种怀疑，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当中国人民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好给他们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给他们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解答。

这以前，中国思想界中已经有人谈论社会主义。但那时，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这种学说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次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表明，资本主义的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的路。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发动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总之，十月革命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解放的

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就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他在 1918 年 7 月和 11 月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起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 1914 年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进行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只有日本、美国的在华经济势力仍有所扩张），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二百万人左右。各种社会问题，包括劳动和资本间的矛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各新式学校里的学生也迅速增加。还出现一大批新式学校的教师和记者等，形成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三、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兴起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1919年上半年，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决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齐聚天安门广场，

举行示威。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曹、章、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示威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阻，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因为遍寻曹汝霖不见，就放火烧曹宅。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学生被捕者三十二人。学生们在斗争中联合起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两万五千名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在反动当局的严厉镇压下，斗争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第一天，学生被捕者一百七十余人；第二天，又有七百余人被捕。

正在这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的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章、陆。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英勇地出现于斗争先头的是学生群众，他

们起了先锋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则成了运动后期的主力军。由于在斗争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比较确切的阐明。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一向醉心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

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

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针对当时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当时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在各地方出版的刊物上，有不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1920年3、4月间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在五四以后逐步认识到“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五四运动中一批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这时也开始了思想方向的转变。湖南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后，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和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

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其他著名的学生领袖如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先后走上这条道路。一些老同盟会会员，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董必武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并没有抛弃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民主不再是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为主体的民主。为此，他们强调必须铲除少数人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科学当然包括自然科学，但是人们对社会的研究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所以，讲科学，首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革命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取消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相反，给了反封建以更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的武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思想文化的社会根源。他们把反封建主义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方式，从由少数人进行的宣传工作，发展到主要由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实践，从而推动中国人的思想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解放。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习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尽

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初主要还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促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所进行的主要工作。

四、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得到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讨论过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然后他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具体帮助陈独秀等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小组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成立共产主

义小组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国也有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小组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习惯地一律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的主要活动是：

(一)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杂志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推动建党工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还利用已有的或自己创办的公开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同月，出版了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阶级争斗》以及《社会主义史》等也陆续翻译出版。这就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一些共产主义小组还利用原有的或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团体，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党造就最初的骨干。

(二)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派别也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号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虽然在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实际

上强调的是，中国由于产业落后，中国没有条件成立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他们认为，中国主要应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种主张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们指出，不能离开时代条件来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从当前的国际条件和国内社会情况来看，不可能在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

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是有深远影响的。

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曾占有优势。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强权，也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无政府主义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看起来又似乎十分激烈和彻底的主张，很适合那些不满社会现实的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黄凌霜等人写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

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强权无疑是应当反对的，但不能反对无产阶级的强权。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